

“以一人救一国”,“以一人敌一国”。这是晚清著名商人张謇的话。张謇的商业帝国在十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又在几年间迅速衰落破产,都是因为情怀。

张謇的商业帝国如何崩塌?



作为一名商人,张謇有着极为宏大的抱负,他一生信奉两个主义,在经济上信奉“棉铁主义”,也就是依靠棉纺织业和冶铁业发展国民经济;在政治上则坚信从“村落主义”中可以找到拯救中国的方法。所谓“村落主义”,其实就是地方自治的代名词,在封建社会谈“自治”二字要冒的风险实在太,所以张謇采用了一种变通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想。

除了创业初期手头拮据的那几年外,张謇总是不遗余力地把钱用到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种类上。据史料记载,在大生纱厂开办之后的十余年间,张謇陆续开办了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盐业公司等。这样大规模、多种类的兴业办厂,令人望尘莫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当大生纱厂顺利运转起来之后,纺纱原料——棉花的来源成了问题。此时张謇做出惊人的决定:围海造田种植棉花!为此他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筑起拦海坝,先后造田十二万亩,仅此一项便前无古人。张謇办垦牧公司,也是为了给南通人一个稳定的就业来源,这其中所体现的依旧是他为民谋利的情怀。然而张謇的实业之路却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当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时,一道又一道阴影如同永夜般拦住了他的去路。

张謇曾经试图将南通的自治模式扩展到更大范围,为此他推动了“徐州建省”计划,也就是在苏北建立一个独立于江宁以外的政治经济中心,此举触及了地方官吏和朝廷大佬的各方利益,在他们联手阻挠下,徐州建省仅仅是设立了一个名义上由漕运总督改名而来的江淮提督而已,与张謇当初的构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另一个打击是,后来他极力谋求与外国资本家联手兴办海外贸易公司,最终也因为帝国主义不愿意张謇把企业做大做强而以失败告终。

徐州建省和海外贸易的接连失败,让张謇逐渐变得急躁冒进起来,他深恐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有生之年不能得以实现,于是加大力度进行各项实业投资,此后短短数年间,他在没有认真考虑成本与销路的情况下,又在大生一厂、二厂的基础上接连建了六个大型纱厂,到了大生八厂建成时,这种违背企业经营规律的大规模兴厂行为已经让大生公司不堪重负。

可叹的是,此时的张謇为了让南通成为一个在民生经济上真正不依赖于外界的自治区,又接连动用企业利润兴办教育与慈善机构。他在当地总共开办了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高等学校,还设立了新育婴堂、墓园、栖流所、养老院、济贫院、女红传习所、残废院、聋哑学校……甚至还修了700余里的马路。客观上说,张謇的慈善事业对于缓解南通社会矛盾,培养企业所需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对于已经因为投资不善而效益不佳的大生公司来说,如此大规模地捐助慈善事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由于逐年亏损和负担过重,大生公司终于挺不住了,致力于“以一人救一国”的张謇终于到了不得不考虑向外国借款来维持企业日常经营的地步。让人意想不到的,此时竟然是日本人站了出来,答应帮助张謇。

悲剧的是,张謇先前的“以一人敌一国”,“一国”指的也是日本。张謇

的从商之路起于中日甲午战争给他带来的刺激,他生平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头号大敌。从他创办大生纱厂之初订立的《厂约》中,可以明白地揭示出张謇开办纱厂的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本所必须,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敌,无异沥血肥虎。”他执著地认为,只要能在南通将日本人的经济势力驱逐出去,那么全国各地自然会以此模式为借鉴,达到在全国范围内驱逐日商的目的。

张謇的大生纱厂在起步之初,凭借着当地人对日本历年剥削的仇恨,顺利取得了原料与销路,还多次在纺纱和织布领域狙击日本商人,让日本人损失惨重,可以说日本商人对张謇恨之入骨。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以极低的利息提供给他3000万到6000万的资金摆脱危机,张謇此时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他为了大生公司的未来,还是准备接受这笔借款。然而让张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借款本身就是一颗裹着蜜糖的毒药,此后两年间,尽管他屡次催促,日本人却迟迟不履行借款合同。

等到“一战”结束后,原本无暇顾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缓过气来,迅速扼紧了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喉咙。再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导致民生凋敝,原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大生公司首当其冲,在原料供应、生产设备、产品销路等各个领域受到沉重打击,很快就不得不宣布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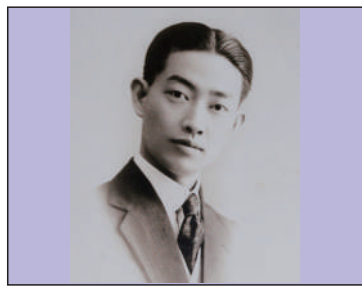
张謇一手创立的商业帝国终于轰然倒地,失去了信念支撑的他,晚年是凄凉的,他曾这样叹息:“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张謇自始至终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悲剧性英雄,他的理想追求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情怀带给了他勇往直前的勇气,却也埋下了悲剧收场的伏笔。(据《北京晚报》)

曾国藩:十六字家风箴言

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曾国藩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且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勤”。曾国藩坚持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三个字捧红梅兰芳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广告,上面仅三个字:梅兰芳。原来,梅兰芳先生初到上海,虽唱功绝顶,但要一下子出名也难。当时替梅兰芳筹划的这个戏班子就想在报纸上打广告,宣传梅兰芳先生。但怎么引起人注意呢?他们在报纸上印了三个字——梅兰芳,之后什么都不说,这样广告便登出去了。第一天就开始有人议论:“这梅兰芳是谁呀?”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不小的版面三个大字——梅兰芳。这下子议论的人就多了,连登了几天之后,上海市街头巷尾就都在议论了:“您知道梅兰芳吗?”市民都在互相打听,梅兰芳的名声越来越响。连登了一周之后,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个详细的广告:“梅兰芳——京剧名旦,今晚在上海某某戏院登台献艺。欢迎观看。”这广告一出,票立即卖了个精光。大家都想去看看梅兰芳唱得究竟怎么样,看看梅兰芳先生的功底。于是梅先生一唱走红,一下子知名度就提高了。

顾祝同:暗度陈仓抢名伶

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时,战区副司令官上官云相为了改善部队的艰苦生活,特地从苏州请来一位京剧名伶史文卿,为国军官兵和当地群众演出。顾祝同倾慕史文卿,为了把她弄到手,顾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下令:“在国难当头的艰苦时期,一切都要为了抗战,军人不可以再沉迷于戏台,玩物丧志。如果再发现有人看戏,军法处置。”要求今后所有演出一律停止。因被禁戏,史文卿无处可去,只好跑到顾司令长官那里做“抗战夫人”去了。(本刊综合)

解密历史上的“老人政治”

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老人政治,是在清末民初出现的。慈禧的执政团队中,李鸿章70多岁仍为国事奔忙,慈禧则一直掌权到73岁去世。在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4位总统,袁世凯、孙中山都是死于总统任上;蒋介石的“总统”干到88岁,蒋经国的“总统”也干到了78岁。

不过,他们初登政治舞台的巅峰时,年龄并不算老。孙中山、蒋介石第一次当上最高领导人的年龄分别在45岁、41岁。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到老了才执政,而是在执政的位置上慢慢变老。所以,所谓老人政治,其实就是变相的权

力终身制而已。这些政治家并非出于单纯的权力欲“宁愿留恋权力不放手”,而是近现代政治转型的激烈政治斗争使得领袖不能轻易退出政治舞台。慈禧、蒋介石都曾一度让出权力,但最后仍卷土重来,或者即使不在最高职位上,也要在幕后掌握权力。因为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一旦失去权力,必定会遇到不可预测的后患。所以,一旦掌权,绝不放手,就成为权力斗争的铁律。

最成问题的老人政治,则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老人政治。历史上慈禧太后最大的恶行并非剿灭太平天国,而是

代表保守派二次垂帘听政,扼杀了近代中国最有可能的宪政改革“百日维新”。所以,“老人政治”中最应警惕的是取向之保守,利益之固化,而非单纯的年龄。如果算年龄的话,70多岁才当选总统的里根,其右翼进取型内政和外交策略使美国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并且赢得了冷战;今年67岁的希拉里,在内政外交上仍持进取心态。在中国,伟大的改革者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已经将近90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远远走在很多年轻人前面。

(据《老年生活报》)